

◆阿占

棋盘街往事

棋盘街上无正北。路和房子，皆东南、西北走向。老家伙们说，这是在给季风让地方，硬物儿侧侧身，夏天的东南风、冬天的西北风，就能在棋盘街上找到入口和出口，长风驱人间，诸事好不敞亮。连光照也变长了，每日在屋里停留许久。光照一长，时间就有余额似的，分派在老家伙身上，都是大寿限啊。

具体说开来，棋盘街上纵横交错，每个路名都拣了吉字：东光、丰盛、德盛、振兴、芙蓉、庆祥、大成、万寿、阳明、福寺、龙门……建筑风格被称为“里院”，棋子般安放着。花岗岩青石底座，雕花木扶栏，方形的天井与回廊。既有西方排屋的影子，也有中国老四合院的布局。一开始，“里”为商，“院”为居，功能清清楚楚。后来人口多起来，芜杂，吵嚷，就顾不上许多了。包括大门洞常年被用来摆摊儿——两扇相当气派的楸木门去向全无，只剩石砌的拱形大门洞，动辄三米长宽，高度相当于二层楼，能挡风遮雨躲日头，是门，也是路，往来必经之，势必聚人气，不用起来可惜，曾经的楸木门再贵气，和安身立命相比，已经不重要了。

对于我来说，20世纪80年代的棋盘街是再熟悉不过的。每次跟着母亲从前海沿儿回娘家，就等于从冷艳风景区来到了人间烟火重地，密集并且喧闹。外婆所在的那个里院，是周边体量最大的，四条马路将其包围，四个门洞，各有各的门牌号，也各有各的生意。偏东的，卖针头线脑和土产。偏南的，剃头，修鞋。偏西的，租小人书。偏北的，烧茶炉。

烧茶炉的总是最受欢迎。远远地就能听见蒸汽排出时发出的哨音。水已经开了，提着暖瓶的人们，从周边里院汇聚而来，彼此打着招呼，吃了吗？那个时候，一暖瓶水一分钱，一角钱买一个水牌，水牌印有十个方格，打一暖瓶，在水牌上敲一个章。

◆李剑

供销社的那些事

提起“供销社”，许多中老年人印象很深。特别是在乡村，那一排排建设精致、装饰考究的青砖瓦房，砖混结构的水泥柜台……是当时除了公社党委大院之外最气派的建筑，售货员也是男不愁娶、女不愁嫁，是令人羡慕的好职业。

童年的时光多是在乡下奶奶家度过的，那时没有其他商业机构，更不允许个体经营，于是，村里的供销社便成为商品流通的唯一平台，人们有事没事都喜欢到供销社里聚聚聊聊。

小时候的我对甜食特别钟爱，奶奶的零花钱几乎都买了点心、糖果之类，供销社就是奶奶时常带我光顾的地方。记得供销社的柜台很长，奶奶经常把我抱到柜台上玩耍，大人们都喜欢逗我玩，让我表演节目，有些大方的顾客买了好吃的东西也会塞进我嘴里作为奖励。尤其是售货员在称完红糖、白糖，倒入用于包装的草纸后，秤盘上总会遗留或多或少的颗粒，此时，奶奶就会抱着我，让我把嘴巴贴近秤盘，用舌头去舔那些沾在秤盘上的甜甜的颗粒。时间久了，每当听到有顾客要称糖时，奶奶总是先帮着售货员用干净的抹布蘸上去水把秤盘擦净再称，这样潮湿的秤盘上会沾上更多的糖粒，好让我这个小馋猫舔到更多的糖。奶奶的“智慧”和疼爱让我享受到了同龄人未曾体验到的甜蜜，也让我的童年增加了一份美好的回忆。直到我长大成人后，许多长辈还把我“啃秤盘子”的故事当成笑料讲。

七八岁时，我随同当教师的父母到了另外一个公社生活。那时，物资十分匮乏，甚至国外的化肥袋子进口到国内都是上好的布料，于是找供销社主任讨要化肥袋子的人络绎不绝，公社有头有脸的人物都用这种装化肥的尼龙袋子漂干洗净后做成衣服，黄不拉叽像绸缎一样飘飘洒洒，还隐约可见“xx制造”，尽管不太雅观，但也是够时髦，能穿上这样的衣服算是身份的象征。当时流传着一段顺口溜：大干部，小干部，一人一条化肥裤，前边“日本产”，后边是“尿素”……

那时逢年过节，许多商品都要凭票供应。每到这时，供销社采购站的门口都会乱七八糟地堆放着猪爪、猪头、下水、带鱼等节日物品，猪头上都贴着人名和斤两，猪耳朵里塞着号签，很远处就能听到负责分配的人大声叫喊“张三的头”“李四的下水两副”……叫到谁，谁就屁颠屁颠地去领，弄得大家哭哭不得。那时，只有吃国库粮的职工才有资格按官级大小凭票购买，如果谁能摊上半边猪头或一副下水，一家人就能过个肥年。

当年教师的工资低，社会地位也低。一次，我跟爸爸去供销社，看见有刚进的“靠鱼子”（一种大海鱼腌制的咸鱼），爸爸便想买些回去，一问昂贵的价格超出预料不少，爸爸惊讶得直摇头，掏了半天钱包的手又缩了回去。售货员好像认识爸爸，一脸鄙夷，轻蔑地说：“这年头，老师还想吃靠鱼子，也不看看口袋里有多少金豆子……”引得周围的顾客哄堂大笑，爸爸窘得无地自容，至今提起这事老爸还是气不打一处来。

供销社的商品都是明码标价，不存在讨价还价之说，一些紧俏物资还需凭票购买，大到电视机票、自行车票、手表票，小到布票、糖票、肉票、化肥票，五花八门。遇到商品减价、甩卖，也多被关系户、消息灵通人士优先购得。记得当时购买结婚用品，从电视机到暖水瓶，都要找一位在供销社负责的阿姨打听什么时候到货。

我的一位同事告诉我，他十六七岁招工进了供销社。当时，售货员的标配是白衬衣、蓝裤子，量布料的直尺插在衬衣领子后方，神气十足。加上小伙子细高挑、国字脸，一表人才，引得村里的俏姑娘、小媳妇本来一趟就可以买完的针头线脑、橡皮铅笔都要分成三四次到供销社买，为的就是多看几眼这个吃国库粮的帅小伙。小伙子工作既卖力又认真，领导交办的事情做得又快又好。当年，社里的几个老员工年龄大、心眼多，变着法子搞点小贪小占的鬼把戏。于是乎，三天两头地安排小伙子挑水往酱油缸里掺，然后加上盐搅匀往外出售。老职工月底就用涨出来的酱油款偷偷偷发烟抽，发酒喝，小伙子始终被蒙在鼓里。若干年后的一次聚会上，他才听老工友们揭开这个谜底。

1990年，我在乡镇工作的时候，供销社还属于特权单位，那时虽然已允许多种经营模式共存，但市场还不够繁荣，商品种类比较单一，一些紧缺的农资，比如二铵、尿素、柴油等还需按计划分配。乡镇领导和供销社主任都有三批条子的权力，没条子和有条子的比，价格要贵出两至三倍，能找领导批张条子买化肥那也是好大的人情，更觉得有脸有光。

大概是1993年吧，供销社已经改制。一次，我带3岁的女儿回老家，大晴天，她却在村供销社看中了一双绿色的泥靴，哭闹着让抱她玩耍的大爷爷给买。记得那时供销社已是承包经营，可以随便讨价还价了。疼爱她的大爷爷买下了这双靴子，如今还放在鞋柜里，也成了女儿调皮淘气的“证据”。

烧茶炉老头儿，红脸，光头，高嗓门儿。他还卖烟酒。烟是前门和蓝金鹿，酒是散装的青岛啤酒和栈桥白干。

租小人书的好像是个伥儒，好脾气，也好欺负，加之他那歪歪拧拧的书架子要靠墙找支点，不占地方，门洞底下愈显宽敞，便常年聚着打扑克摆残棋的，咋咋呼呼一片，情绪失控有之，神情凝重有之，断然转身有之，逡巡不前有之。

打扑克的，输不起，兜里没钱，满脸贴纸，被老婆看见，回家免不了是一顿臭骂。摆残棋的是个瘦子，看不出具体年龄。白面，鹰眼，驼峰鼻，两颊刀劈般，大背头黑亮到发贼。他稳坐马扎，脚下摆三四盘残棋，半眯着眼，打量眼前的棋迷，予人高深莫测之感。

残棋既已摆下，自有一试高低的棋迷，更有捡便宜的赌徒。他们见由红方先走，似赢棋不难，便信心满满，放手一试，结果，不到三五回合就被将死。一盘一毛钱，算是交了学费。不服输？再来！

想当然，瘦子也有失手时候。某次，棋痴来战，是个郊区青年。他在残棋前看了许久，蹲下，对瘦子说，这棋只能下和，谁也赢不了。瘦子看了青年一眼，轻蔑地道：只要下和，就算你赢。青年拿起棋子就走，瘦子跟往常一样，立即应了一招，双方一来一往，运棋如飞，没几分钟，走成了和局。青年站起，说这不过是“泥马渡康王”，只要看过排局的棋书，你就赢不了。瘦子注视青年片刻，点点头，我倒是把你看走眼了。

门洞底下，离残棋不远，中间隔着伥儒的小人书，有两个常年下围棋的。一盘象棋，快则几分钟，慢也顶多个把钟头。一盘围棋，半个下午是常有的，没谁有耐心看，久而久之，也就没谁看得明白了，只剩两个沉默的下棋人，犹如隐居一般。细看，原是



■《栈桥清雾》
秦凤至

◆董兴宝

寒冬茶梅

“小院犹寒未暖时，海红花发甚迟迟。半深半浅东风里，好似徐熙带雪枝。”这是宋代诗人刘仕亨在《咏茶梅花》中对茶梅的描写，诗中的“海红花”即茶梅花的花舌。

在诗人的笔下，一个小院里，冬天寒冷，茶梅花儿有点像不畏严寒的梅花，依旧在雪中绽放。

这种叶儿如茶花，花型似梅花，因而得名茶梅的花儿，一般是生长在长江以南的城市，三面环海的青岛，虽然属于北方，但美丽的茶梅花儿，继承了梅花和茶花的耐寒特性，依旧可以在户外生长。在崂山区深圳路的口袋公园里，种植了几株茶梅，碧绿而厚实的叶丛中，白色和粉色的两种花儿争奇斗艳。

茶梅的花期长，在青岛的供暖期里，每年的11月到来年的3月，这种看似娇嫩的花儿，不畏严寒，傲雪绽放。

寒冬的北方地区，百花凋零，平日里那些高大的树木，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然而宋代诗人陶弼称赞茶梅“名誉漫多朋援少，年年身在雪霜中”的说法，却是十分贴切：在这冰天雪地的大地上，美丽的茶梅花儿，很少有朋友相伴，年年在雪霜中绽放，在这寒冷的北方城市里，更是难能可贵。

◆温言

蔡元培有多爱青岛

爱上一座城市，原因有很多，或许是因为风景，或许是因为友人，对于教育家蔡元培来说，爱上青岛，以上所有的条件都具备。

蔡元培（1868—1940年），字鹤卿，号子民，浙江绍兴人。这位被毛泽东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大师，栖栖惶惶足迹遍及华夏。但谈及中国最好的地方，则首推青岛。

“8月28日，午前九时，乘普安轮赴青岛，同行者，蒋浩率粹盛、怀新、英多三儿。送行者无忌、宝香、张其浚、徐季荪姻叔、陈宝言内表弟。”“8月29日，午后二时，船到青岛。来接者刘梅垞表兄、蒋右伦、袁道九、赵元任、李济之、赵太侔、李超夫妇、沈市长代表等。暂住观海一路十号刘宅。四时，沈成章市长偕叶玉甫君来。赵元任夫妇偕二女来访。市政府秘书长胡秀峰来。教育局长雷法章来。”这是1934年《蔡元培日记》的记录。

在此之前，蔡元培不止一次来过青岛，第一次可以追溯到1903年。

1903年6月15日，蔡元培到青岛学习德语，为去德国留学做准备。他离开上海十余天，便发生了轰动全国的“苏报案”。6月底，上海租界工部局与清政府达成交易，派出巡捕多人闯进苏报馆，先后逮走章太炎、邹容等人，查封报馆，蔡元培因在青岛，侥幸免遭牵连。在青岛，蔡元培的第一位德文老师是李幼庵。李老师为广东人，深谙德语，在青岛承办工程，设立《胶州报》。后来因事多，推荐一个德国传教士教蔡元培德语。但不到两个月，蔡元培接到长兄的电报回到上海，德语学习也中断了。可以说，青岛庇护了蔡元培，是他的福地。

再来青岛是1929年7月6日，私立青岛大学因蔡元培的到来即将重生。私立青岛大学的停办，让青岛的大学教育又回到了原点。在这次来青岛之前的6月13日，蔡元培就已经接到了教育部的聘书，与何思源、傅斯年、杨振声等为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

5天的短暂停留，造就了一所名师荟萃的大学。蔡元培与时任教育部部长蒋梦麟以及筹备委员，一起到汇泉饭店（海滨旅馆，今城建集团办公楼）举行筹备会议，根据山东大学的校史记

一个老者和一个壮年。老者风黑，壮年月白。老者虽驼背，气势却未消，中指压着食指，夹一颗棋子拍在棋路上，那清脆的拍子声，似要把陈年已久的豪情全宣泄出来。中年精干，浑身肌肉贴骨，一颗棋，考虑十几分钟已是快的。二人对坐，弈棋时，专心致志，诸事不闻不问，仅靠一只手的中指、食指，在棋局中手语交谈。众人纷纷略过去，直过了残棋摊儿，才回头说，看呀，那下黑白棋的，当真是黑似乌鸦，白如鹭鹭。

小儿如我，自然是看不明白的。只偶尔听到外公和大舅谈论起来，说什么运筹棋子斗智斗勇，说什么落子节奏的变化、放布棋子的力道，都可看出当局者的心智深浅。还说黑白二人不按套路出招儿，跟着心走，有自己的定式。也跟着天气走，风向变了，定式也会变。说到底，黑白二人在找一种平衡，输赢不是目的，一种圆满调和的“道”，才是二人想要的……诸如此类，听得我一头雾水。

后来，时间如风一般掠过，棋盘街上物非人非，老者升天，壮年成了老者，众人都忙着赚钱去了，找个来面棋的十分费劲，他只好自己和自己弈棋，左手执白，右手执黑——黑棋占角，白棋小目。黑棋小目，白棋星位。黑棋一间高挂。白棋托，黑棋扳。白棋退，黑棋接住。白棋跳出。黑棋拆边——立二拆三。白棋大飞挂角。黑棋小尖——把角上守住。白棋超大飞挤边，黑棋逼住……

外公也升天了，大舅到了外公当年的年纪。他说话跟外公很像，有时甚至能让我混同一人。大舅在说话，就是外公在说话，大舅说：孤独的弈棋者分饰黑白二角，悔棋，搅局，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其实等于在演自己，以及自己的经过与念想。人这辈子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



◆崔均鸣

书缘

1965年春天，我降生在胶东某个穷乡僻壤。等我到了启蒙的年龄，读书这件事情已经“无用”了。母亲是一名乡村私塾先生的女儿，她不仅耳濡目染地识得了一些文字，还不管不顾地从娘家带出来一批线装书籍。躲过了“破四旧”的风潮后，那些书被小心地保存了下来。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开始，我早早地便与书结了缘。另外还有一些无头无尾的故事书，也被我囫圇吞枣地读过。多年过后，我才知道，那可都是大名鼎鼎的《西游记》《三国演义》《七侠五义》《烈火金刚》和《野火春风斗古城》啊。

小时候，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早饭地瓜干主打，午饭地瓜干当家，晚饭还是地瓜干唱主角。餐桌上虽然放着几个玉米面饼子，那也只有临近就餐结束前才可以“凭自觉”地掰一块，吃下去，“蒙蒙顶”。但在支持孩子读书方面，母亲却从不吝啬。印象深刻的是，当年镇上的新华书店里新进了两本连环画《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每本售价一角二分。由于供不应求，只租不售，每天租金一分钱。母亲带上我便去了新华书店，她交上昂贵的五角押金后，直接告诉店员：“你把押金收好吧，我们就不来还了。”另外，当时的农村不通电，家家户户都靠煤油灯照亮，母亲却专门买了蜡烛供我们读书时使用。这些举动曾经让左邻右舍很是费解，私下里没少嘀咕这娘们“大手大脚”“不会过日子”。但母亲依然如故，她坚定地相信读书是一件“顶重要的”事情。她告诉我：“只要把书读好了，你长大后就可以摆脱‘土坷垃里刨食吃’的命运。甚至可以去镇上供销社里当一名售货员，风吹不着，雨淋不着，还能每天吃上白面馒头。”

如果说我“爱读书”的兴趣是母亲培养和支持的功劳，那么“会读书”则是中学老师教育和引导的结果。记得有一次我在物理课堂上偷偷阅读《红楼梦》被抓了现行。事后，我被老师叫到办公室受到了一番温和的教育和开导：“会读书远比爱读书更重要。有些书虽然是名著，但不是当下一定要读的。读书要分轻重缓急，学以致用，人生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需要阅读的重点书目，不能仅凭兴趣去行事。现在你最需要重视的是课本和与课本相关的专业书籍。把课本弄懂读透，等你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后再读《红楼梦》一点也不晚。”老师的话让我醍醐灌顶，马上明确了读书的方向和重点。

1984年9月，我如愿考进山东海洋学院（现中国海洋大学）水产系读书。1988年7月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被选进国家农业农村部水产司工作。此后，几经辗转，我回到青岛，并很快“跨界”从事了我所热爱的新闻工作。其间，读书与写作成为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我牢牢铭记中学老师当年的教诲，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一些与新闻工作密切相关的相关的专业书籍。先后阅读了《新闻学》《新闻学概论》《新闻写作》等，现蒸热卖，迅速应用到了新闻采访实践中去。有一段时期，我被组织安排去从事报刊发行工作，我还恶补了一些与报业经营与报刊发行相关的书籍。那个时候，书籍像一位温情贴心的朋友，给了我工作上的具体的指导和帮助。书，不仅让我开阔了眼界，还给我的未来之路“加了油”。

回望来路，读书的种子在我的心里发芽生根之后所带给我的变化是巨大的。虽然，我并没有像母亲当年规划的那样去镇上的供销社里当一名售货员，但却顺利地进了城市，用上了电灯，也吃上了白面馒头。与此同时，我在读书的过程中获得了无限的乐趣，也结交了许多“同道中人”。从世俗意义上讲，也算是岛城一位小有名气的“名记”和“作家”了。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但也衣食无忧。

眼下的我已经接近退休年龄了，读书生活的“功利色彩”渐渐淡化，相对悠闲的时间里，可以自由地读一些我喜欢的书目了。《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红与黑》《呼啸山庄》《傲慢与偏见》《巴黎圣母院》《基督山伯爵》等名著一本接一本地读下去，惬意而自在。如此美好的时光，悄悄滑过每一天的日落和日出。有书读的日子是充实的，读自己喜欢的书是快乐的。

从爱上读书到人生读书，再到自由读书。一条长长的人生轨迹，总有书籍如影相随。这样的日子，夫复何求！

